

# 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

1895—1914

第二輯

上冊



中華書局

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中國近代經濟史參考資料叢刊

第二種

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

第二輯 1895—1914年

上 冊

汪 敬 虞 編



## 內容提要

本輯錄中日甲午戰爭以後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二十年間（1895—1914年）有關中國近代工業史的文字和統計資料，就本期外國帝國主義在華工業投資、國內封建政府在中國工業中的活動、民族工業的初步發展及其發展過程中的若干特點、和中國工人階級的狀況等方面，提供一些基本資料，以說明本時期工業歷史發展過程的大體輪廓。

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中國近代經濟史參考資料叢刊

第二種

## 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

第二輯 1895—1914年

（全二冊）

汪敬虞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字第17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 毫米 1/32·44 5/8 印張·18 插頁·960,000 字

1962年8月新1版

1962年8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2,500 定價：(9) 6.50 元

統一書號：11018.353 57.4.科學型

## 序

1895—1914年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時期。中國的近代工業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標誌。中國近代工業在這個時期的發展及其發展過程中所表現的特點，能具體地描繪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初步發展時期的時代特徵。

中國近代工業在這20年當中是怎樣發展和變動的？它表現了一些什麼樣的特點？我們在這裏根據本書所收輯的材料，作一些初步的說明。

總的說來，這20年中國工業發展的情況是：在資本主義列強進一步破壞中國原有的經濟結構、國內市場繼續擴大的條件下，民族工業在整個20年中，特別是在從1905年開始的收回利權運動時期，有了比較顯著的發展。和民族工業同時並存並且妨礙民族工業發展的外國在華工業和清政府的所謂官辦工業，在這20年中，都起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外國在華的工業投資，在這20年中有了飛躍的擴展；這個時候的中國，除了當作外國商品的宣洩市場以外，又進而淪為幾個國家的資本激烈競爭的場所。民族工業在市場和資本上，承受着雙重的壓迫。來自帝國主義方面的壓力，這是民族工業發展之受到阻礙的一個主要方面。

另一方面，國內封建政府對民族工業的關係，則是雙重的，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後，特別是在維新運動之後，曾經採取了一些獎勵工商業的措施，並且把原來的一些官辦工業招商承辦，表面上似乎

是要由上而下來推動民族工業的發展。但是實際上，和帝國主義互相勾結的清政府，只會優待外國在華工業，而不能在經濟上（如資金、運輸和捐稅等方面）給民族工業創造發展條件。有之，則是和封建政府比較接近的工業資本家的上層，享受到比較特殊的待遇（如專利等），使一部分人得以更方便地利用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特殊地位，排斥中小資本家的發展和自由競爭。整個民族工業的發展則受到了很大的阻礙。至於所謂官辦工業的招商承辦，則不過是這些企業在封建大官僚手中，已經無利可圖，甚至成為沉重的負擔，在“有利者留、無利者去”的原則下，推給商人去收拾罷了。真正有利可圖的企業，則往往禁止商人染指，當然更談不上鼓勵民族工業了。

面臨着國內市場的繼續擴大而同時又受到國內外反動勢力的壓迫的民族工業，它的發展，不但是緩慢的，而且是迂迴曲折的。表現在：上層的資本家，得到一些發展，中小資本家，則得不到發展；有一個時期，出現了短期的繁榮，另外一個時期，則表現普遍的蕭條；在這一個場合下，資本家依附封建勢力以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在另外一個場合下，則又回過頭來依附帝國主義以反對封建政府的箝制。在各帝國主義者之間，則往往是或者依附一個帝國主義者反對另一個帝國主義者，或者利用他們之間火併的空隙，以圖短暫的喘息和發展的機會。民族工業和國內外反動勢力存在着複雜的矛盾，同時又保持了血肉的聯繫。

帝國主義的侵略，在中國發展了它自己的對立物：不但發展了和它對立的民族資本，同時也發展了直接反對它的中國工人階級。在資格和年齡上都超過了資產階級的中國工人階級，在這 20 年中，隨着帝國主義在華工業的大量擴充和民族工業的初步發展，得到了迅

速成長的機會。中國工人階級被剝削奴役的悲慘狀況及其反抗鬥爭的堅決態度，在它的成長初期，就已經很鮮明地表現出來。

以下我們就大體上按照這樣一個次序，作一些輪廓性的敍述。

首先，我們看一看帝國主義在中國工業投資的情況。

這 20 年中，帝國主義在華工業的擴張，我們可以先從兩個總的比較中，得到一些概念。第一是拿這 20 年的投資情況和 1895 年以前的投資情況來加以比較。我們知道，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取得設廠權，雖然是由 1895 年的馬關條約正式確定的，但是外國在中國設廠的事實，在 1895 年以前，就早已出現。在 19 世紀的 40 年代，廣州、寧波、上海這幾個最早通商的口岸，就已經出現了小型的外國工廠。雖然在那個時候，大部份工廠是為商品輸出（如修理船舶）和原料榨取（如磚茶製造與繅絲）乃至文化侵略（如印刷）服務的，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帶有以資本輸出為目的的性質。然而，比起 1895 年以後的 20 年來，我們一眼就能看出，只有在這個時候，資本輸出，才成為列強對華經濟侵略的時代特徵。本書第一頁的統計，就明顯地擺出了這樣的一個事實。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在 1895—1913 年不足 20 年中，資本在十萬元以上的外國大型工廠創辦時的投資，共為一億零三百多萬元，差不多超過了前此五十餘年的投資的 13 倍。這樣一個巨大的變化，自然不單純是一個量的變化，而是包含着質的改變在內的。

其次，我們再拿同期中國民族工業的投資額來加以比較。在本書第三章中，我們就歷年設立的資本一萬元以上的中國大小工廠作

了一個初步統計<sup>(1)</sup>，根據這個統計，把其中資本額在十萬元以上的挑出來加以計算，它們在創辦時的資本，一共是一億零七百萬元，與上述同期外國工廠的投資約略相等。這個比較，必須聯系到下面這樣一個事實，才能得出全面的意義。這就是：上面的投資數字，都是設廠時第一次投下的資本，工廠成立以後的擴充、縮小以至停閉，都不能在我們的統計上得到反映。而實際的事實是：外國的大企業成立以後，擴充得非常迅速，我們在本書第 37 頁上可以看到，七個較大的外國煤礦在 1899—1913 年的 15 年間，投資擴充了 40 倍，這就是一個證明。相反，中國工廠成立以後，能够順利發展的，只是極少數，多數則陷於停滯窘困的境地。中國紗廠是發展比較順利的一個工業部門，它在這 20 年中，曾經有過兩度高潮，但是，在本期設立的 19 家紗廠中，祇有南通大生紗廠等少數幾家，能够繼續擴機增資，其餘大多數則莫不失敗易主，以致改組、出租、出賣的情況，已經發現的，就有 29 起之多<sup>(2)</sup>。紗廠如此，其他工業的情況，可以想像得之。所以我們雖然得不到這 20 年中中外工廠、礦場的實際投資數字，但民族資本之處於劣勢地位，則是無可懷疑的事實。這是 1895—1914 年 20 年間帝國主義工業投資擴張的總的情況。

正如水銀瀉地一樣，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工業投資，是無孔不入的。從重工業的機器、造船到輕工業的紡紗，從投資巨萬的礦冶工業到手工製造樟腦工場，都無一不滲透了外國的資本。但是在這樣全面進攻的局勢之下，我們還是可以看出來他們的投資重點的。在這 20 年中，礦冶、造船、紡紗、煙草和公用事業中的水、電、煤氣這五個

(1) 本書第三章，附錄一，歷年設立的廠礦名錄。

(2) 參閱本書第三章，並參閱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頁 143。

工業部門的投資，差不多佔了全部投資的 91.2%<sup>(1)</sup>。正是在這幾個主要的工業部門中，表現了本期帝國主義對華工業投資的一般特點，值得我們進一步加以分析。

第一是在這 20 年中，帝國主義在華的工業投資，已經形成了中國工業上的壟斷力量。大家都知道，外國在中國的幾個大的工業壟斷組織，都是在這個時期內形成的。煤礦工業中的開灤、福公司、撫順、本溪湖、山東華德、井陘、臨城七大煤礦在 1913 年的產量就超過了六百萬噸，單是開灤、撫順兩礦就各佔二百多萬噸，而當時全國煤產量，却不過七百六十多萬噸<sup>(2)</sup>。機器造船業中的耶松船廠，在 1900 年合併了上海的另外兩個船廠以後，資本由七十五萬兩增加到五百五十七萬兩<sup>(3)</sup>，壟斷了當時上海的整個造船工業。1902 年成立的英美煙公司，在成立以後的十年中，工廠由一個擴充到四個，工人由百餘人擴充到近萬名，資本由十萬○五千元擴充到一千一百萬元，超過了當時中國所有煙廠資本的 7 倍<sup>(4)</sup>。在公用事業中，英國資本的上海煤氣公司，在 20 年中，資本增加了 5 倍，變成了“製造煤氣比歐洲和美洲以外的任何英國煤氣公司都要多”的龐大托辣斯<sup>(5)</sup>。紡紗工業中，英、美、德三國一口氣在 1897 年成立了四個紗廠，加上後起的日本上海紡和內外棉，差不多佔了中國棉紡織業的半個天下。帝

(1) 本書，頁 3；均指設廠時的投資。

(2) 本書，頁 38；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頁 124。

(3) 本書，頁 237；孫毓棠：中日甲午戰爭前外國資本在中國經營的近代工業，頁 13。

(4) 本書，頁 23, 208, 216, 399；愛蘭等：遠東經濟發展中的外國企業，頁 169。

(5) 本書，頁 22, 268。

國主義的托辣斯組織，不但壟斷了工業的一個單一部門，而且往往壟斷了工業中的幾個部門乃至國民經濟中的許多部門。這個時期中形成的兩個最大的壟斷組織——英國的怡和洋行和日本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就是壟斷了很多經濟部門的大托辣斯。怡和洋行投資的範圍，從保險、地產、輪船、碼頭以至電車、鐵道，在工業中，則不僅是紡紗，而且包括了繅絲、打包、木材、電燈、製糖、製冰、冷藏。從 1832 年怡和洋行成立之日起，到 1914 年止，先後成立的企業，就有 30 個單位，資本至少在四千萬元以上<sup>(1)</sup>。抱着獨佔東北的野心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則是一個以投資鐵道為主的大托辣斯。這個公司在 1906 年創辦的時候，額定的資本即為兩億元，1920 年一躍而為四億四千萬元，“如此巨大的資本，以三井公司或三菱公司之財產，或足與之比較，但僅一公司而有如此巨大資本者，在日本固無之，即以財力充實之正金銀行論，……亦僅及滿鐵資本之半數耳。由此觀之，滿鐵不僅在日本公司之中，高據王者地位，……即在世界擁有如是鉅資者，亦寥寥可數。”<sup>(2)</sup>

在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下的中國，各帝國主義大資本的壟斷與各國在華勢力範圍的搶佔，就有不可分的聯系。這在採礦工業上表現得最為突出。我們從本書第一章第二節所列舉的割定和壟斷礦產的條約、合同和各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礦區的割據與爭奪中，就看得很清楚。具體的情形，不在這裏重複敘述。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礦區的割據，多半是以軍事和政治力量作後盾，取得了條約上的保證，經濟侵略和軍事、政治上的侵略是密切結合起來的。在中國的領

(1) 本書，頁 330—331。

(2) 本書，頁 341—342。譯文經編者略加更改。

土上第一個被帝國主義掠取的大礦——山東華德煤礦，就是由兩個傳教士的被害，在德國的大炮口底下被強佔去的。“這樣一種行動，在國際禮節上，是史無前例的。它甚至破壞了國際道德中最起碼的信條。它由此在基督教的教義和西方文明的名字上有意地留下了無法抹去的污點”<sup>(1)</sup>。

在各帝國主義大資本的壟斷和勢力範圍的劃分底下，包含着最尖銳和最激烈的競爭。我們用不着提那些人所熟知的礦區的爭奪，在那裏，各帝國主義者對每一個礦區，都像爭食着一支骨頭的幾隻餓犬。在製造工業裏面，競爭激烈的程度，也是不減於礦區的爭奪的。英美煙公司在瀋陽設立了工廠和推銷機構以後，日本立刻成立了東亞煙草株式會社，“對英美煙公司展開了猛烈的競爭。”這種競爭，日本人自己稱之為“其他任何地方看不到的激烈的煙草戰。”<sup>(2)</sup> 機器造船業中的大托辣斯耶松船廠，在 1900 年合併了上海兩大船廠——祥生、和豐——以後，剛剛慶幸他們自己從此“可以免於粗暴的競爭，”<sup>(3)</sup> 却又碰上新的對手——萬隆、瑞鎔等船廠。他們的股東在 1906 年就這樣說：“現在興起了一批企業，並且能够賺錢，它們都是我們的對手。”這就使得“他們[指耶松]的生意，並不是隨時都順手的，他們須付出大量的精力，兜攬生意。如果對手們削價競爭，他們也須還之以削價競爭。……如果需要的話，他們在價格上可以比他們的對手降低 5%，如果有必要，就讓他們終年賠本不要一文股息吧。……他們最

(1) 本書，頁 52。

(2) 本書，頁 235。

(3) 本書，頁 239。

後還是會勝利的。”<sup>(1)</sup> 還有什麼比這些激動的言辭更能體現出競爭的激烈麼？

同樣“削價競爭”的情形，就是在劃分了勢力範圍的煤礦業中，也會經常地出現。在英國資本的開平和日本資本的撫順之間的情況，就是這樣。從撫順煤礦大規模的生產開始以後，在華北的市場上，撫順煤和開平煤就開始進行了激烈的競爭。1911年，“撫順煤的價格，每噸已經由12元減至10元，而它的競爭者則正以9元出賣。”<sup>(2)</sup> 可見，壟斷是不能消滅競爭的，競爭產生壟斷，但壟斷又一再地產生競爭；壟斷消滅了自由競爭，但同時它又為最殘酷的和不斷的競爭創造了條件。各帝國主義在中國工業投資的競爭，有力地證明了列寧的這個真理。

當然，尖銳的競爭，並不排斥暫時的聯合和妥協。大煙草托辣斯英美煙公司就曾經這樣宣稱：“英美煙公司實一萬國公司，”“蓋兩國製造家，知同行為敵必至兩敗而俱傷，不若通力合作，成一偉大製造家之為愈。”<sup>(3)</sup> 但是這種口頭上的宣言，並沒有改變這個托辣斯最後全部入於英國掌握的事實。暫時的聯合，不說明別的，它只說明“互相傾軋”的尖銳化。我們在本書第185頁看到德國資本參加了英國紗廠等的投資，但是接着我們又看到俄國道勝銀行扼死英國協隆紗廠的事實。讀者看了這條材料，難道就真的相信道勝銀行之扼死協隆紗廠，就如協隆的費龍先生所說的那樣，只是由於道勝銀行的總行不在上海而在聖彼得堡，因此“不應希望從遠在數千哩以外的一個銀行

(1) 本書，頁255。

(2) 本書，頁176。

(3) 英美煙公司在華事蹟紀略，頁5。

的董事會得到許多同情的關懷”麼<sup>(1)</sup>? 自然不是這樣，這只是再一次說明列寧的上述真理。

和生產的壟斷、資本之集中於少數壟斷集團這一特點分不開的另一特點，是外國資本的地域集中性。如我們所看到的，除了礦場以外，這 20 年中所設立的工廠，規模比較大的，都集中在上海和少數幾個通商口岸。在幾個主要投資的工業部門中，機器造船廠和紡紗廠，全都集中在上海；水、電、煤氣工業和煙草工業，也都是從上海開始的。外國工業之集中於少數通商口岸，這是由於大都市集中了一切大工業所必需的現代金融、交通、動力等方面的條件。同時，“帝國主義列強根據不平等條約，控制了中國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sup>(2)</sup>”也給外國工業之集中於這些口岸創造了前提。

但這只是一面，和這一面同時並存的另一面則是“帝國主義列強從中國的通商都市直至窮鄉僻壤，造成了一個買辦的和商業高利貸的剝削網，造成了為帝國主義服務的買辦階級和商業高利貸階級，以便利其剝削廣大的中國農民和其他人民大眾。”<sup>(3)</sup> 在帝國主義在華工業中，拿英美煙公司來說明這樣一種情況，是最恰當不過的了。這個煙草托辣斯的生產機構，雖然只集中在上海、漢口和瀋陽幾個大都市中，但是它的推銷網，却通過中國的商人、買辦組成的代理商號，一直伸入到中國的內地和邊疆。打開本書第 230 頁的推銷網圖一看，從東北的琿春、哈爾濱到西南的思茅、騰越，這個剝削網的無遠弗屆，真令人觸目驚心。這不禁使我們想起了生長出許多觸鬚的章魚，這個

(1) 本書，頁 188—189。

(2)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 598。

(3)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 599。

章魚的主幹，雖然盤踞在中國的通商口岸，但是吮吸中國人民的血液以維持它的營養的，却是伸向中國窮鄉僻壤的觸鬚！

當然，從吮吸中國人民的血液看來，直接剝削中國工人的低廉勞動，這還是最主要的。因此，有必要在這裏進一步考察外國資本對中國工人的剝削，也就是具體地考察帝國主義在華工業利潤的高度。

科學地計算資本的利潤率，是要受到統計材料的限制、因而是比較困難的。我們在本書中所計算的 47 家外國廠礦的利潤率，實際上是賬面的純利對已繳資本的百分比。它沒有包括各種形式的變相利潤和隱藏利潤，因此，它一定遠遠地低於實際的利潤。但即使根據這樣計算的結果，47 家廠礦的賬面盈利率，在這 20 年中平均達到 14.14%，而個別廠礦，則甚至可以高到 30—40%。<sup>(1)</sup> 大家知道，在同一時期，資本主義國家本國工業的利潤率，却很少超過 10% 的。我們拿日本這樣一個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來加以比較，同一紗廠“上海分廠的利潤要比在日本的紗廠平均超過 10% 至 15%。”<sup>(2)</sup> 在三井系統的上海紡 1914 年的股東大會上，它的主席就這樣向股東們宣布：1910—1914 五年中公司的盈利就等於實收資本的 135%。<sup>(3)</sup> 這樣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如英國的漢口和豐麵粉廠在一年零兩個月中就可以將全部所投的資本收回；<sup>(4)</sup> 水、電、煤氣工業中三大托辣斯上海電力公司、上海自來水公司和上海煤氣公司，在 20 年中的盈利，相當於創辦時資本的 12 倍乃至 32 倍。<sup>(5)</sup> 說這些事業是吃人的事業，這

(1) 本書，頁 360, 383—397。

(2) 本書，頁 358。

(3) 本書，頁 196。

(4) 本書，頁 374。

(5) 孫毓棠，前引書，頁 75, 97；本書，頁 386—388。

是一點也不過分的。

我們說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工業是吃人的事業，不僅在於它這樣毒狠地吮吸中國人民的血液，而且在於它把資本剝削得來的中國人民血汗又繼續變成剝削中國人民血汗的資本。在 20 世紀初年佔了中國發電業一半天下的上海電力公司，我們能相信，從帝國主義者口袋中拿出來的資本，只有區區五萬兩之數麼？可是這是事實。英國的老公茂紗廠老闆就拿他的紗廠情形給我們作證，證明這並不是上電一家所獨有的現象。他在 1914 年就這樣對股東們透露過：“紗廠現共有紗錠 40,096 枚，這個數目是在沒有要求增加資本的情況下，從 1900 年起由一個 30,000 紗錠的紗廠添置起來的。”<sup>(1)</sup>所以如果我們以為帝國主義搾取高額利潤的資本，全是它所輸出的資本，那就錯了。我們只要翻翻歷史，就可以看到，這些把中國當作冒險家的樂園的人物，有許多是白手起家的。60 年代來到中國的美查，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人物。他“初到中國來時，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小茶商。……他依靠他的買辦們的‘效勞’，在上海二十餘年經營了六個企業，還購置了房地產，回國時總計剝削中國人民所得，已是個百萬富翁了。”<sup>(2)</sup>原來百萬富翁，就是這樣變來的！我們不妨再翻翻歷史吧，1899 年有一個俄國的辛笛加為了和其他各帝國主義分子爭奪遼東礦產，在給盛京將軍的一個申請書中，曾不打自招地說道：這些外國人，“他們之中，有一半是沒有財產和職業的流氓”。<sup>(3)</sup>人們可以看出，只消這幾個字，就把所

(1) 本書，頁 199—200。

(2) 孫毓棠，前引書，頁 45。六個企業，原註為江蘇藥水廠，燧昌自來火局，美查肥皂廠，申報館，點石齋石印局和申昌書局。

(3) 本書，頁 153。

有把中國當作冒險家的樂園的“百萬富翁”的嘴臉，勾得恰如其分。

1895—1914 年，這是帝國主義分子叫嚷着“我們不應該坐着不動，”“應該行動起來”的 20 年，這是帝國主義分子在中國“處於所向無敵的地位”<sup>(1)</sup>的 20 年；1895—1914 年，這是他們一旦把旗幟掛起來了以後，“就不願再把它取下來”的 20 年，這是他們“決不留下一塊石頭橫在他們的路上，妨礙他們的企業應有的發展”<sup>(2)</sup>的 20 年。如果說，在 90 年代以前，帝國主義在中國投資的企圖，還遇到一些微弱的抵抗，那麼，這 20 年却是帝國主義工業投資的揚長直入的時代了。如果說，在 80 年代，還出現過像清政府大官僚左宗棠阻止美國設立紗廠的交涉的事件<sup>(3)</sup>（儘管這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那麼，這個時候，却是滿眼把中國礦權雙手奉呈給帝國主義分子的周學熙和給外國礦產充當忠實的衛護和走狗的袁世凱了。的確，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工業投資，曾影響到中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且異常加速這種發展的，”但是，中國的資本主義，在國內的封建主義和強大的帝國主義面前，却顯得那樣地軟弱無力，以致於它們受着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又和內外反動勢力保持血肉的聯系（這一點，我們在下面敍述民族工業的發展時，還要談到）。

在 19 世紀的 90 年代，帝國主義者一心以為他們在中國的吃人事業是要永遠昌盛下去的了。他們再也沒有料想到他們最後會失敗在這塊土地上。但是，他們畢竟失敗了。他們必須把“掛起來了”的旗子取下來；搬開的石頭，正好打得他們腦漿迸裂。而站起來的，却是

(1) 本書，頁 239。

(2) 本書，頁 89。

(3) 參閱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卿汝楫，美國侵華史，第二卷，頁 171—189。

翻身了的中國巨人。

歷史的規律，就是這樣的不可抗拒！

## 二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這 20 年中清政府在現代工業中的活動情況。

大家都知道，清政府之創辦工業，是從生產軍火的軍用工業開始的。從 60 年代到 90 年代 30 年間，清政府為了加強軍事，維護自己的政權，曾經辦了不少的而且規模也比較大的軍火工廠。進入到 90 年代以後，在我們所考察的 20 年中，所謂軍用工業，還是在一直繼續。軍用工業的本身，不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對中國近代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說來，所產生的作用和影響是比較小的。當然，90 年代以前，清政府也已經開始創辦了一些生產商品的所謂民用工業，但是在早期的民用工業中，商品生產的性質，還是不顯著的。幾個比較大的民用工業，如左宗棠創辦的蘭州織呢局，主要是為了供應“西征軍”的需要；沈葆楨創辦的台灣基隆煤礦，主要是為了供應福州船政局的需要；李鴻章創辦的開平煤礦，則主要是供應輪船招商局的需要。一直到 80 和 90 年代之交，當李鴻章、張之洞等大官僚插足到當時盈利最豐的紡織工業時，工業作為一個“興利”事業，才受到清政府的注意。在這不久之後，中日戰爭爆發了，戰爭結束之後，中國的財政起了一個嚴重的變化。這是因為馬關條約給清政府加上了一個沉重的賠款負擔。馬關條約第四款規定：“中國約將庫平銀二萬萬兩交與日本，作為賠償軍費。該款分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萬兩，應在本約批准互換後六個月交清；第二次五千萬兩 應在本約批准互換後十二個月內交清；餘款平分六次遞年交納。”加上退還遼東半島所附加的三千

萬兩酬銀款，一共便是二萬三千萬兩。這個總數，幾乎等於 1894 年清政府歲入的三倍，而第一年的付款，則等於當年歲出的總數。<sup>(1)</sup> 這樣一個沉重的財政負擔，對清政府說來是空前的。為了償付賠款，彌補虧空，清政府除了對外“借洋債”，對內“加釐金”、“加鹽課”、“推廣捐例”等辦法以外，很自然地就會注意到充裕庫餉的“興利”事業上來。光緒在 1899 年的一個“上諭”中就對當時能够獲利的開平礦務局、漠河金礦、直隸遷安金礦以及輪船招商局、電報局、鐵路等，一一加以考查，要求認真整頓。<sup>(2)</sup> 而原來生產軍火的軍用工業，也因“靡帑已多，未見明效”，漸漸有人要求“於製造[軍火]之暇，兼造各種機器。”<sup>(3)</sup> 中國最大的一個兵工廠——江南製造局，就是在這樣一種空氣底下，於 1905 年將船塢和機器部門，改為商廠，“以江南機器廠之名變為純粹商業機構。”<sup>(4)</sup> 無論新辦民用工業也好，改變原有的軍用工業為民用工業也好，都說明了清政府從充裕國庫的觀點上來考慮了工業的資本主義經營。這樣一個特點，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前，至少是不很顯著的。這是本期所謂官辦工業的第一個特徵。

清政府在現代工業中的活動，從開始就是由一些封疆大吏來進行的。其中李鴻章和張之洞要算是兩個主角。如果說李鴻章是 90 年代以前的一塊頭牌，那麼，在這 20 年中，張之洞要算是一個最活躍的角色了。這些代表封建統治的大官僚，其所以熱衷於新式工業，除了這些企業能給他們帶來經濟上的利益以外，還在於它能夠給大官

(1) 劉嶽雲：光緒會計表，1901 年。卷 1，頁 2。

(2) 東華續錄，光緒，卷 154，頁 17—18，光緒 25 年 6 月。

(3) 本書，頁 461。

(4) 本書，頁 463。